

第三届《人民子弟兵》优秀节目评选

DI SAN JIE REN MIN ZI DI BING YOU XIU JIE MU PING XUAN

飘扬,共和国的旗帜

中央电视台军事部 编

白山出版社

27

前 言

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栏目，到1990年已开办十周年。十年来全体从事电视军事宣传的同志，经过艰苦的努力，在这块并不狭小的天地里，播出的电视专题超过四部（集），赢得广大电视观众的喜欢和爱戴。1989年第三届《人民子弟兵》优秀节目评选，正值军事专题创作高峰，象《飘扬，共和国的旗帜》、《血沃中原》、《飞向新世纪》、《胖连长和他的连队》、《神兵天降八十三》、《小哨兵》、《钟楼下，小院内》等一大批军事专题都进入了得奖的行列。无论从其主题思想的开掘上，还是表现方法的创新上，都是值得认真学习借鉴的。为了推动电视军事专题片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特意把本届部分获奖节目的解说词汇印成册，献给热爱电视军事宣传的同行，以留作学习与纪念。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台研究室周金华同志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1991年5月

目 录

飘扬, 共和国的旗帜……………(总政) 周 岩 肖 平 (1)
祖国不会忘记

……………(国防科工委) 彭继超 苏方学 刘江海
袁 炜 奚启新 李鸣生 (38)

血沃中原……………(中央电视台 海军电视剧制

作中心 湖北省委) 所国心 董 滨 赵洪滨 (65)

飞向新世纪……………(空军) 石玉增 凌 雁 (138)

威武的乐章……………(武警总部) 王国才 姚风顺
褚嘉华 黄明德 (158)

胖连长和他的连队……………(沈阳军区) 冷治夫 (174)

大炮车队……………(沈阳军区) 王 伟 (178)

小哨士兵……………(济南军区) 于长征 (183)

那老头? 老那头! ……(沈阳军区) 白 洁 张 嘉 (187)

钢筋铁骨英雄汉……………(成都军区) 许建华 杨 洪 (193)

再见荒山……………(沈阳军区) 冷治夫 (198)

神兵天降八千三……………(成都军区) 许建华 (202)

和平树下……………(济南军区) 徐海婴 步伟利 李宇平 (213)

广真嫂子……………(济南军区) 徐海婴 (222)

钟楼下, 小院内……………(成都军区) 周 可 (227)

小站的故事……………(总参) 窦益山 翟树杰 (233)

中国军队的窗口·····	(北京军区)	王鹏举 陈建中	(239)
四十岁的兵·····	(沈阳军区)	王 伟	(244)
金桥在特区架起·····	(南京军区)	沙 封 华 越	(249)
大写的人·····	(武警总部)	褚嘉华	(256)
现代夫妻哨·····	(二炮)	尹卫星 安和平	(268)
大别山的回声·····	(广州军区)	谭光荣 李德禄	(272)
捕蛇新说·····	(沈阳军区)	冷冶夫	(284)

飘扬，共和国的旗帜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纪实

第一集 风波骤起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这里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西方大国不甘心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失败，企图进行武装入侵，实行经济封锁，但都可耻地失败了。于是，他们把改变中国颜色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梦想“和平演变”、“不战而胜”。几十年来，他们从未放弃这一根本战略。

近十年来，他们趁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处心积虑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使我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他们的附庸。

在我国，党内党外也有极少数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多年的思

— 1 —

想、舆论和组织准备。

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到处组织反动的政治性“沙龙”、“论坛”、“研究会”，经常进行非法集会，宣扬西方的“蓝色文明”、鼓吹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叫嚣要开创中国社会的“新纪元”。

〔推出片名：风波骤起〕

这个因顽固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被国外某些人称之为“民主斗士”的方励之，几年来一直同国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他利用报刊和大学讲坛，大肆散布“社会主义都是不成功的”、“共产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的障碍”、“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死了”等反动言论。叫嚣要“解散中国”，“从国外引进一个总理”。《河殇》的顾问金观涛在他们组织的讨论会上公然叫嚷：“社会主义的尝试与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之一”，“中共的唯一出路是让别的组织上台”。

1989年，当惊蛰的春雷刚刚在天际响过，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蠕动起来，扬言“必须行动”，要借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建国四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煽起学潮，制造动乱。

2月初，方励之与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成员陈军等人发起签名活动。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借此煽动，向党发难。方励之、苏绍智等人在北京频繁组织聚会，进行

反动宣传。声称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抵制、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连续开三次就要上街了”。一位名叫张显扬的所谓“精英”人物同后来成为“高自联”头头的王丹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现行政治体制必须废除，中国人还要经历几次教训，诸如社会动乱等。”

3月1日，清华、北大同时出现《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主张“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不久，北大三角地又贴出一张《给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号召青年学生“在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宣称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强迫政府实行方励之所主张的全盘西化。

这个严家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对台湾记者说：“不论大陆政治、台湾政治、香港政治，民主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这个身为讲师的刘晓波，竟厚颜无耻地说：“民主”“自由”就是要“以夷制华”，不要怕人家说“丧权辱国”，“要彻底否定爱国主义”，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必须充当“三百年殖民地”。这样露骨地鼓吹卖国主义的论调，连港澳台的同胞都感到惊讶！

一切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民，在这里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口口声声所宣扬的“爱国”，他们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就是这样的一些货

色！

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晓叮也跳出来鼓动说：“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能从宪法上消失，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必将高悬在人权利益之上。”我们就是要“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人权”！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下，4月15日，胡耀邦同志不幸猝然病逝。党中央对耀邦同志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对治丧作了周密的安排。首都各高等院校内设立了灵堂进行祭奠活动。但极少数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以为他们的时机已到，公然跳出来要借题发挥，提前发难。他们造谣说“胡耀邦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气死的”。以此蛊惑人心，煽动群众。这样，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骤然爆发。

广大学生悼念耀邦同志是出于真实的感情，深切的哀思。但极少数人以“悼念”为借口，组织非法游行，到处张贴大小字报，恶毒攻击、咒骂党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他们先后提出“七条”、“九条”、“十条”要求，来要挟党和政府，其核心的两条是要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为反对自由化平反。与此同时，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有的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这就充分表明，学潮一开始就背离了广大青年学生的良好愿望，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表现出了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对立。

《新观察》杂志和《世界经济导报》也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为动乱呼风唤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对总编辑钦本立作了组织处理。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江泽民同志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人们或许不会想到，中国的动乱，会使国外、境外的反动势力如此欣喜若狂。美国的反华分子遥相呼应，公然打出“打倒共产党”的旗帜满街乱窜。

台湾的反共势力也得意忘形地说：共产党不行了，“四十年苦心等待，终于时机来了！”台湾国民党中常委认为：“亡共在共复国机会到了”。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学潮从一开始就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就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操纵，所利用。

4月18日、19日，在幕后组织者的策划下，一些人把花圈抬到了新华门前，借机寻衅闹事，制造事端，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发生了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冲击中南海事件。

在少数人的煽动下，失去理智的人群，疯狂地向保护中南海安全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干警投掷石砖和玻璃瓶。军队和警察始终保持着克制和忍让。

4月19日夜間，一位北师大女學生遇車禍身亡。有人造謠說：“軍警開車軋死學生”，使不明真相的學生情緒激動。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將沖擊、圍堵新華門的學生強行帶離現場，送回北京大學。又有人無中生有的把這說成是“4·20血案”，還說什麼“警察不光打學生，還打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一時間，這些謠言籠罩着北京的大街小巷，使一些人的情緒更加激憤。

4月22日，黨中央決定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會。21日夜，動亂的組織者就策動了數萬名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

大會堂內莊嚴肅穆，哀樂低徊。

大會堂外狂呼亂叫，震耳欲聾。

這難道就是一些人所標榜的對胡耀邦同志的悼念嗎？

這個煽動學潮的風雲人物、後來成為“高自聯”頭頭的吾尔开希根據后台指揮者事先的精心安排，挑頭提出要向黨和國家領導人遞交什麼“請願書”。

有人為了製造攻擊李鵬同志的口實，又精心策劃了一場騙局。他們先是造謠說，“李鵬總理答應12點45分出來接見廣場上的同學”，接着又宣稱“李鵬臨時變卦，拒不接見，欺騙學生”，煽動起廣場上數萬學生的強烈不滿。

三名学生用跪倒在大会堂台阶上的这种方式，演出了一场所谓请愿闹剧。其用意正如他们后来所说的：在于争取人们的同情，以便挑起更大的事端。

于是，极少数人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

耐人寻味的是，当广场上的学生冲击大会堂时，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大会堂楼顶平台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后，却悠然而去，打高尔夫球去了。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却以种种理由加以推托。4月23日，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在出访朝鲜前开会研究，他仍然没有采纳。

4月23日晚，北京21所院校的部分学生，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非法的“高校临时委员会”，即后来的“高自联”，成为这次学潮和动乱公开的指挥中心。

他们不满足于搞乱北京，还要搞乱全国。4月23日，北师大出现了《到全国去》的大字报，提出“南下北上、西行东走”，发动全国性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哈尔滨、上海等地的高校，都出现从北京去串联的学生。北

京也有天津、河北、安徽、河南、上海等地来的学生参加游行。

在同一天里，西安、长沙发生了打、砸、抢、烧的严重违法事件。吾尔开希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时竟然说，我们就是要冒天下大乱的危险。

国外某些政治势力同国内的动乱组织者配合十分默契。美国白宫发言人急忙发表谈话，公开支持中国的这场所谓“民主自由运动”。“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10多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造谣宣传（同期声）。

台湾当局先后派遣近千名特务混进大陆，积极活动，插手动乱，他们混杂在广场游行集会的人群中，煽风点火，鼓动学生，蓄意扩大事态的发展。

在局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李鹏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对问题的性质作了正确的判断。邓小平同志完全赞同常委判断，并做了重要谈话，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

政治斗争。”社论还明确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开来。

这篇社论的发表，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动乱策划者们不得不急忙地改变他们的斗争策略，“高自联”秉承方励之和他的老婆李淑娴的旨意，当晚发出了“新学联一号令”，对第二天游行的标语口号作了统一规定。前几天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突然不见了，代之以“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等口号，并把“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政府”等颠覆性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而把他们真实的政治目的暂时掩盖了起来。

党、政府和各高等学校根据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工作，劝导学生停止罢课游行，尽快复课。4月29日，袁木等同志代表国务院和北京市，在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组织的会上，同学生代表座谈对话，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表明了党和政府的态度（选播同期声）。

在袁木等同志与学生对话以后，北京市李锡铭、陈希同等领导同志也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各高校党、团组织做了不少工作。局势开始有了好转。5月4日的游行比前几天的游行人数少了，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这次游行之后，80%的学生复了课，全国各地的局势趋于平稳。事实说明，“4·26”社论是非常正确的。

可是，正当事态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时候，党中央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国以后，采取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立场，使动乱急剧升级。

请看下集——动乱狂潮。

第二集 动乱狂潮

由于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致使动乱愈演愈烈，急剧升级。

〔推出片名：动乱狂潮〕

赵紫阳在访朝期间和回国以后，都曾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就对付当前动乱所作出的决策，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又指责“4·26”社论定性错误，要加以修改。5月4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中央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出席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说什么“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那些制造动乱的人从他的讲话中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他的这个讲话，成为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

赵紫阳的这篇讲话是他的原秘书鲍彤事先写好的。讲话一结束，鲍彤即指使各报要在显著位置发表，电台要连续广播三天，要大量收集和刊登正面反映。经过这样的大肆渲

染，给动乱的组织者撑了腰，打了气。而各级党、团组织和群众骨干则无所适从，有的伤心得流泪，学校工作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5月6日，赵紫阳又要求新闻报道放开一些。一时间报纸、广播、电视大量登载学生游行、罢课以及社会各界声援学生的报道，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首都新闻界的一部分人，还走上街头声援，为动乱呐喊助威。

动乱的组织者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要求同政府“对话”，一面却组织绝食活动。5月13日，北京20多所高校的200多名大学生组成绝食团，在饱餐一顿后，宣布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请愿”。在许多群众看来，这一事件的出现显得有些突然。因为，绝食请愿的要求主要有两条：

（一）明确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二）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这两条要求早几天他们就提了出来，可是，就在中央办公厅正式答复他们，同意与高校代表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的几个小时后，他们急急忙忙抛出了早已拟好的《绝食宣言》，声称由于政府拒绝对话而不得不绝食。

绝食的组织者、策划者拿学生的生命作代价，胁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拿举世瞩目的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国际影响来要挟党和政府。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的“拳拳爱国之心，眷眷爱国之意”。

5月15日，由于绝食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我国政府欢

迎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仪式不得不临时改在机场举行，工作人员甚至来不及在机场铺上合乎礼仪的红地毯。访华议程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等活动也被迫取消。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每个正直的公民无不为此感到愤慨，但那些动乱的策划者，却感到惬意，因为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党和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会接受以绝食为手段的要挟条件。但对绝食的学生十分关怀，协助红十字会，先后派出100多辆救护车和许多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同学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

北京市委、市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为绝食学生送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工人在广场及时清扫卫生，配合医务人员洒药，防止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18日大雨前，北京又从公共交通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供绝食学生避雨。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应。相反，极少数蓄意制造动乱的人却变本加厉，把学生的生命当人质，誓与党和人民为敌到底。

绝食过程中，不断有人加入到绝食队伍中来，最多时绝食者达3000人，围观的群众则更多，截止到19日，累计有3500多人次因绝食晕倒，其中2500多人次留院治疗。在整个绝食期间，无一人死亡。

我们不禁要问，那些高喊“人权、博爱”的西方国家，何曾做到这样仁至义尽！

那些参与绝食的学生，可曾想到自己的生命已被极少数人当作向党示威的筹码！

《人民日报》、《新观察》等报刊对游行、静坐、绝食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把闹动乱的人着意渲染成“天之骄子”、“民族精英”，一时间造成一种极不正常的空气，似乎不参加声援就是不爱国，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

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北京声援。而恰恰是这种声援，使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无法收场，把他们逼向绝路。

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写信打电话，对新闻单位的做法表示愤慨，要求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毫无效果。有人打出“为了国家，为了孩子，为了母亲，请不要再去声援了”的标语，5分钟之后就被人扯碎了。他们就是这样只允许策划动乱的“自由”，而不允许反对动乱的自由。

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这时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为动乱或呐喊助威，或出谋献策。5月16日，严家其、包遵信等所谓的“文化精英”聚会发表声明，一面宣称他们从动乱中“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一面以“参加绝